



今日聚焦

# 民生凋敝成为导火索,军方与反对派举行政权变化后首次会议,称双方协商组建文官过渡政府

## 苏丹总统巴希尔下台了,为何示威还没完

■本报记者 安峥

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军方赶走4天了,但大批示威民众却没有离开。军方似乎成为他们新的反对目标。

新上任的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13日发表了上任后首次电视讲话。布尔汉发表电视讲话后,苏丹职业人士协会作为街头示威的主要组织团体发布声明,对军方所作回应表达不满,呼吁民众继续示威。他们要求军方尽快把权力交还给文职政府,而不是实行长达2年的过渡期。有评论称,未来几天将是决定局势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

### 民众不满“套路”?

苏丹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在2011年南苏丹独立前,它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如今也是非洲第三大领土,位于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交汇处。

4月11日,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奥夫宣布推翻巴希尔统治,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代行国家权力,他本人担任主席。苏丹政府被解散,宪法暂停执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定于两年后举行大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指出,这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并不陌生,比如2013年埃及军方领导人塞西推翻“穆兄会”代理人穆尔西就是同样的方式。他们都不是军队直接动用暴力机器,而是借助民众抗议的压力,利用军方手中的权力,推动政局发生变化。

然而,讽刺的是,苏丹民众因为巴希尔黯然下台的喜悦没能持续多久。路透社称,11日军方讲话后,数以万计的抗议者继续在街头示威,要求军方尽快“退场”,实行文官统治。

12日,苏丹政坛再现戏剧性一幕:刚刚上任一天的过渡军事委员会“大换血”;“一把手”奥夫和“二把手”总参谋长马希双双辞职;军方三号人物、争议较小的布尔汉接任主席一职。此外,让人“敬畏”的苏丹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戈希将军也于13日辞职。

“眼下对军方有利,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他们在短短几天内赶走两名有权有势的将军。有评论称,作为军事委员会新的头号人物,布尔汗鲜为人知,他一直都是陆军指挥官,直到最近才领导一支步兵师。他的任命被视为军方对抗议活动的一种安抚,但这无助于回答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比如军方退位的可能时间表。

苏丹军方与反对派13日证实,双方举行政权变化后的首次会议。布尔汉当天申明,他将与反对派协商组建文官过渡政府,暂时管理国家事务,过渡期最长两年,随后举行选举。

“抗议者的诉求也很容易理解:军方还政于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姜恒昆指



出,因为军方与前政权过从甚密,军方过渡政府“换汤不换药”,当然不是他们想要实现的改变。

“苏丹自1956年独立以来已有过4次政变,”刘中民指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套路——取消宪法、宣布紧急状态——民众早就知道了,最终目的无非是加强管理、巩固权力。民众对此感到失望,他们想尽快结束过渡政权,让新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刘中民指出,苏丹政坛有一个“怪现象”:在历次政变后,军政府上台时都是意气风发,都想尽快恢复秩序,实现经济发展。但执政时间越长,对权力的不安全感越厉害,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反倒适得其反,最后还是因为民生问题沦为被民众“革命”的对象。

### 一切都是经济?

舆论普遍认为,民生问题是本轮动荡的起因:去年底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和严重通胀,也是巴希尔在执政30年后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

“民生凋敝既是巴希尔被推翻的导火索,也是根源,”姜恒昆指出,从2011年南苏丹独立开始,苏丹丧失了三分之二的石油资源,而石油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苏丹经济的支柱。原本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戛然而止,对苏丹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

“尽管巴希尔政府此后也作出诸多改革,比如大举发展采矿业,但仍无法弥补石油行业的巨大损失。从2011年起,苏丹经济持续下滑,始终面临食品、燃料短缺,通胀严重等经济困难,其通胀率在去年高达80%。紧接着情况更为特殊,面粉供应出现短缺,国家又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补充供应,从而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达3倍,工薪阶层首当其冲。尽管去年以来,巴希尔展开‘穿梭外交’,但仍没能化解危机。民众看不到希望,这是巴希尔政府下台的最主要原因。”姜恒昆说。

“如果说经济发展长期困难,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导致巴希尔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刘中民指出,那么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统一与分裂、宗教与世俗、独立与依附等多种复杂矛盾的存在,使苏丹始终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

具体而言,英国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为苏丹维护统一种下隐患。两大族群(阿拉伯人和非洲裔)的矛盾长期存在,使得苏丹多次陷入内战,和平时期在国家历史上只有短短十几年。内部,达尔富尔问题,中央与地方反叛势力的割据迟迟不得解决;外部,冷战时期追随苏联,后来又在与西方关系上摇摆,使其不得不把国家力量投入到维系政权安全上去。

另有评论指出,除了经济困难,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苏丹政权更迭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内部,巴希尔在抗议爆发后应对不力。“他当时的做法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让军方控局,重组政府,将18个州的州长都换成军人。这些举措极不明智,非但不能遏止反政变浪潮,反而更推倒他的力量,从而促使政权变化更快到来。”姜恒昆指出。

外部,有评论称,尚不清楚在苏丹争夺影响力的地区权力角逐——如沙特、埃及、卡塔尔和阿联酋——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俄罗斯《观点报》称,美国从不掩饰对巴希尔的不满。

专家认为,巴希尔政府的垮台属于意料之中,但关键还是治理无方。“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上台,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民生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姜恒昆指出。

有评论称,苏丹剧变是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的余波;长期执政的“政治强人”一个接一个谢幕;津巴布韦的姆贝基、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苏丹的巴希尔。

从表面上看,苏丹的遭遇与8年前经历动荡的国家确有共性:经济一蹶不振,通胀与失业严重,群众走上街头,领导层出现分化,当政者成为牺牲品……

刘中民指出,联系到至今仍未解决的叙利亚危机,可以说,8年前的政局动荡仍未有结束,阿拉伯国家仍处于复杂的历史转型中,甚至连沙特等海湾国家也感受到了“民主与民生”两方面压力,都在寻求变革,以改善自身处境。“这可能是个漫长的进程。”

### 新闻分析

## 苏丹未来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安峥

苏丹政局发生变化后,英国《经济学家》指出,谁是巴希尔的接班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反对派并无明显的领导者,而奥夫被视为旧政权的权力人物,很难被民众所认可。

“接下来的几天将是决定苏丹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有媒体如此评论。

### 相比8年前动荡有不同

与8年前西亚北非动荡局面相比,这次的苏丹事件表现出两点明显不同。

其一,民众相对理性,暴力冲突的倾向明显弱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认为,这可能因为他们看到了当年的沉痛教训,渴望国家安定有序地发展,而不是陷入利比亚、叙利亚那样的泥潭。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姜恒昆指出,最活跃的抗议者是年轻人,但居于领导地位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苏丹职业人士协会”,他们在政治上较为成熟,行动上较为克制。

其二,西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较为低调。这可能包含两重信息:其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从过去的案例中得到警醒。其二,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想作茧自缚。

### 未来往哪里走

外界普遍认为,巴希尔的未来有迹可循:他不可能“翻盘”,但人身安全可能无虞;他可能在苏丹受审,但不会被引渡到国外。至于苏丹的未来,舆论众说纷纭。有分析认为,最噩梦般的情形是政府倒台,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也有评论称,最可能的争斗会发生在安全机构内部不同派系之间。

消息人士指出,苏丹军事力量内部的分裂早有端倪。近来,巴希尔能掌控的只是安全部队和警察,而军队显然没有言听计从。这两支力量曾在此次的政权剧变事件前发生火拼,造成军队人员伤亡。于是,军方干脆以此为由头,解除了总统职务。

“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军民结合的政府,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不受欢迎。如果每一方都过于弱势,可能会受到巴希尔时代遗留势力的破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扎克·弗尔汀说。专家认为,军事委员会和文官政府会有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

政治分析师穆罕默德·奥斯曼告诉路透社记者,反对派要求组建文官过渡政府,而军方试图控制国防部和内政部,结果可能是一个文官和军人混合的过渡政府。

### 大使视线

## 明仁天皇的政治交代

■王泰平

今年4月30日,在位30年的明仁天皇将退位。与其父裕仁相比,明仁是一位“别样”的天皇:在权力上,他不能像父亲裕仁战前那样参与国政。因为日本战后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和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宪法明确规定天皇有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条约及召集国会、解散国会、公布举行国会议员选举等权力,但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国政的实权”。从而,天皇便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变为“日本国的象征”,处于无任何实权的象征性地位。

从1989年到现在,明仁天皇主要从事“国际亲善”活动,出席国家重大庆典和慈善活动等。他代表国家出访和接待外国访日的国家元首、重要宾客,因此,可以认为天皇对外的地位相当于国家元首。

### 提醒国民居安思危

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明仁天皇开明、亲民、富有胆识。皇太子时期的明仁拒绝了只能在皇室和贵族(贵族)中挑选太子妃人选的规定,转而迎娶民间女子美智子,拉近了皇室和民众的距离。继明仁天皇之后,他的长子和次子也都

迎娶了民间女子。明仁天皇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态度是“反省”。他即位后,先后出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东南亚和中国,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作为天皇不得不审慎地遵守宪法约束和政治传统,但明仁天皇本人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并经常在重大场合发言。2005年,明仁天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语委婉而语义明确地说:“日本自昭和初年至昭和20年(1945年)几

无宁日。希望今后在更多人的努力之下,继续正确认知有关过去的事实,以鉴未来。”他在历史问题上秉持的诚恳反省态度受到国内外各方尊重。

2019年2月24日,明仁天皇在日本政府举办的“陛下在位30周年纪念仪式”上指出:“过去30年来,日本在全体国民期盼和平的强烈意志支撑下,得以在近代与现代首度拥有没有战争的时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绝对对和平坦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面对很多预想不到困难的时期”,提醒国民居安思危,勿忘和平。

### 强调和平的重要性

日本舆论界注意到,明仁天皇自2016年以来,多次强调日本坚持走和平道路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针对日本国民中普遍存在着“日本向何处去”的担忧,对政治右倾化倾向予以尽可能的牵制。

明仁天皇总共17位日本首相共事过,而安倍晋三是其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据日本《现代周刊》杂志爆料,安倍曾多次要求明仁天皇出席纪念二战战犯相关的活动,并希望天皇表态支持其修宪,但都没有如愿。明仁天皇有自己的信条,更有自己的底线。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直接干预政治,也决不做违心的事。明仁天皇坚持和平与亲民路线,这是给新天皇和皇室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也是顺应时代和民心的政治交代。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外交部前大使)

### 专家论坛

## “拉黑”伊朗革命卫队,美让自己更孤立

■金良祥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认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尽管此前美国政府也多次指责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暗指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但如此明确地将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列为恐怖主义组织还是第一次。此举实在令人费解,也将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进一步下降。

### 美不太可能得到他国配合

伊朗有两支军队,一支为国防军,另一支为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卫队成立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并在两伊战争中得到锤炼,是一支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保卫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朗伊斯兰政权稳定以后,革命卫队也经常在国内执行任务,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开展军事活动,这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指责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因。

革命卫队不仅在伊朗国家军事和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伊朗经济的半壁江山。一般认为,革命卫队经营的产业占伊朗

国民经济的40%左右。

特朗普“拉黑”革命卫队将对伊朗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将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将为美国外交上孤立伊朗和经济上制裁伊朗提供政策依据,这将加剧美伊对立,进一步加重伊朗的经济困难。但美国的政策只是单边决定,不具有多边效力。特别是在当前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以及其他主要大国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上述政策得到其他大国配合的可能性并不大。美国于2月中旬召集以遏制伊朗为目的的华沙峰会,却没有得到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积极支持,便是明证。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上述政策的效果也必然是有限的。

### 进一步削弱美在中东影响力

相反,美国“拉黑”革命卫队的政策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海湾战争确立了其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的力量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然而,2001年的阿

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国力,而且其过度使用暴力的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其软实力。奥巴马政府虽然调整了其前任的政策,但终究未能维持和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以后,美国先后突破了一些本应恪守的禁区,包括退出伊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等,在国际上和地区内都引起了强烈不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式微。

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政策非但不能孤立伊朗,反而可能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拉黑”革命卫队的决定虽经过了特朗普决策小团体的辩论,但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更没有国际共识。以单边方式推动缺乏法理依据和共识的政策将极大地削弱美国中东政策的公信力,使得美国自身更加孤立。同时,上述政策也将使得伊朗与美国的对立进一步深化,将更加坚定伊朗的反美意志。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一个坚决与美为敌的伊朗将会对美国构成长期牵制。



2月3日,一名男子在德黑兰参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陈列的导弹。新华社资料照片

总而言之,美国认定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的政策可能有利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进一步密切特朗普团队与犹太人游说团体的关系,并为特朗普2020年再度角逐总统宝座创造

一些条件。然而,这同时也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非但不能遏制伊朗,反而要付出更多的战略代价。(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